



最後一個浪漫派——沈從文

另眼看作家系列之八

蔡登山 ◎ 文字工作者

雖然沈從文說他是 1922 年離湘來京的，但據學者的考證，應是 1923 年。當時沈從文出於生命意識的初步自覺，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召喚，「為新的人生智慧光輝而傾心」，於是離開邊城來到京城，為的是「尋找理想，讀點書」。然而當時的北京城並未向這位來自湘西的「鄉下人」，張開歡迎的雙手；相反地，一開始他就遭受物質和精神的雙重磨難。他升學失敗、求職碰壁，經常餓著肚皮躑躅街頭，同時還要接受那些招搖過市的紳士淑女們目光的鄙夷和羞辱。燃眉灼睫的困窘，使他拿出筆，鋪開稿紙，在陰冷的雜屋裡寫啊寫的，手上的凍瘡已潰破流膿，鼻孔裡的鮮血也滴在稿紙上，但一篇篇寄出去的稿件卻都沒有被採用。這樣的飢寒交迫，究竟還能撐多久呢？於是他在寫信向外求援，兩天後，一位身著灰布長衫，面容清癯的年輕人來訪，他看到沈從文生活困頓，他站起身來，將脖子上一條淡灰色羊毛圍巾摘下，彈去上面的雪花，披到沈從文的身上。然後邀沈從文到附近一家小飯館吃了一頓飯。他拿出五塊錢結了帳，並將找回的三塊多錢全給了沈從文，他就是年輕作家郁達夫。昔日漂母一飯救了韓信，此時郁達夫一飯救了沈從文，這可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道極其蒼涼而又溫暖的風景。

郁達夫無疑的是識珠者，更是愛才者，此後他大力地介紹沈從文的習作給京城各大副刊。沈從文從小經歷磨難，過早地告別了無憂無慮的童年，形成了他偏於憂鬱的氣質。到北京後，又幾乎陷於極端貧困之中。他的內在氣質和現實感受，使他在創作的起步階段，自然地靠近了郁達夫，他開始學著用郁達夫的自我表現方式來宣洩內心的鬱積，他寫出了〈棉鞋〉等作品。

接踵而至的徐志摩亦無愧為琢璞者，他在自己主持的《晨報副刊》上發表了沈從文的大批小說，而在 1928 年 1 月沈從文離開北平到上海，在他和胡也頻、丁玲籌備、編輯、出版了 4 期《人間》雜誌、8 期《紅黑》雜誌之後，因資金周轉困難，雜誌叫停，而不得不分頭找事做時，是徐志摩將他推薦給當時擔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的胡適。沈從文以小學都沒有畢業的資歷，而登上大學講堂成為教師，這不能不說是胡適了不起的「壯舉」。而這同時對沈從文影響極大，學者沈衛威就指出，在這之前沈從文「鄉下人」的學識和流浪作家的實際身份，使他無法真正成為「新月社」——「現代評論」文人群體的一員，而只能是這個由大學教授或文化名人所組成的自由主義文人群體的邊緣人物。而他與胡適結緣，是他走進現代自由主義文人群體的開始，也是他邁向現代紳士階層的關鍵一步。走近胡適一步，也是他與「鄉下人」疏離一步。但不疏離，蛻變是不可能的（注 1）。

而在 1930 年 5 月胡適被迫辭去中國公學校長後，沈從文也在四個月後辭去教職。他應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陳西澄之聘，到該校任教，當時校長是王世杰，不僅是胡適的好友，也與陳西澄同為「現代評論」的主要人物。而一年後，沈從文又應胡適的學生、青島大學校長楊振聲

之聘，到該校任教。同事有「新月」的同仁聞一多、梁實秋、孫大雨、陳夢家、趙太侔等人。一年後他又回到北平，然而這時候已不同於他初到北平時，一切都變得美好了。他獲得追求多年的愛情，生活也進入了穩定期。一年後，他終於與張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園水榭結婚了。同時他又與楊振聲接替了吳宓主編的天津《大公報》的〈文學副刊〉，並改名為〈文藝副刊〉，他將原本側重學術研究的副刊，轉為繽紛的文學園地。他成為文壇的著名作家和執報紙副刊牛耳的人，更是「京派」文人的重要成員。朱光潛就這麼說過：「他（沈從文）編《大公報·文藝》，我編商務印書館的《文學雜誌》，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糾集在一起，佔據了兩個文藝陣地，因此博得了所謂『京派文人』的稱號」（注2）朱光潛直言不諱地道出媒體在現代文學流派和活動中相互依存的關係。

而就在成為「城裡人」和新紳士階層之時，沈從文又無法完全忘卻他「鄉下人」的本性。他無法忘情山野水鄉的純靜恬美，而在社會革命運動高漲，個性解放精神已難以適應時代的要求之際，再加上他原本就不具備郁達夫那樣強大的浪漫氣質和才情，於是魯迅所代表的鄉土文學就對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沈從文說：「魯迅先生起始以鄉村回憶做題材的小說正受廣大讀者歡迎，我的學習用筆，因之獲得不少勇氣和信心。」（注3）但即使如此，學者陳國恩認為，沈從文並無意追隨魯迅去反映農村的落後面貌和農民愚昧無知的精神狀態；他只醉心於表現鄉土的樸素與寧靜，把它們當成美的極致，或者寫一些美麗而憂傷的愛情故事，來寄託他作為一個「鄉下人」的靈魂的痛苦掙扎。其所以如此，說明了他在突破了郁達夫的「自我表現」道路後，在深層意義上仍受浪漫主義的影響。亦即是說他去除了郁達夫浪漫小說中感傷和頹廢的成分，而讓「自我表現」採取了樸素的形式；或者乾脆把它運用於神話傳說的題材，讓作品增添浪漫的色彩。另外一方面沈從文並不避諱「性」的描寫，但他把郁達夫式的自我暴露，轉換為對自然人性的生動展現，讓大自然清新的氣息淨化了人物的肉慾衝動，凸顯其心靈的純樸（注4）。因此沈從文超越了郁達夫和鄉土文學，以一種邊緣人的立場，在新時代的壓力下，卻堅持地走向樸素優美、洋溢著詩情畫意的田園牧歌。

當然這其間又有著徐志摩和廈名的絕大影響，沈從文說：「在寫作上想到下筆的便利，是以『我』為主，就官能感覺和印象溫習來寫隨筆。或向內寫心，或向外寫物，或內外兼寫，由心及物、由物及心混成一片。方法多變化，包含多，體裁上更不拘文格文式，可以取例做參考的，現代作家中，徐志摩作品似乎最相宜。」（注5）陳國恩指出，於是從徐志摩作品中借鑒了「以理節情」的技巧，不讓筆下放肆，而力求把感情處理到和諧優美的形式中；同時還學習了在獨處中細膩地感知對象的方法，即「就官能感覺和印象溫習來寫隨筆」（注6）。徐志摩詩歌中典雅溫婉的抒情風格，成了沈從文鄉土小說的底色。

至於沈從文向廈名靠攏，是因為廈名在退守社會邊緣時所採取的藝術方向，對處身於動盪之中而又渴望心境寧靜的沈從文，產生了同樣的吸引力。同時他們對鄉土題材本身包含著一份詩意，而優美的風景、純樸的民風、天真的少女，需要用一種與之相稱、最能體現他們恬淡美的風格去呈現，而他們有著類似的要求。然而沈從文的這類小說比廈名的《桃園》、《竹林的故事》那些沖淡的小說，要來得內涵豐富。主要是沈從文的小說尋找到新的支點，他在與現代都市文明形成的張力中，展開了新的視野。鄉村或者說湘西世界成為一種烏托邦力量，來平

衡和釋放他在都市文明中所感到的強大文化衝擊和焦慮。湘西世界是他從「邊城」走向了「世界」之後，從都市對於鄉村的返照，是作為現代都市人的沈從文的審美理想化的鄉村。正因如此，湘西的自然蠻性、素樸潑辣的生活，在沈從文的筆下成為一種審美的對象來把握。

沈從文說：「有人用文字作人類行為的歷史，我要寫我心和夢的歷史」。在〈習作選・代序〉中他說得更為明白：「他無意追求作品與現實的對應」。作品中所營造的那個「鄉土」世界，「這種世界即或根本沒有，也無礙於故事的真實。」亦即說沈從文筆下所營造的世界，是被藝術化了、象徵化了、心靈化了。而他對這個行將逝去的、封閉自足的世界，有著憑弔與撫嘆。他不止一次地真誠而深情地說過，他希望「從一個鄉下人的作品中，發現一種燃燒的感情，對於人類智慧與美的永遠的傾心，康健誠實的讚頌，以及對於愚蠢自私極端憎惡的感情，這種感情居然能刺激你們，引起你們對人生向上的憧憬，對當前一切腐爛現實的懷疑。」（注7）浪漫氣息很重的沈從文，試圖以自己「心和夢的歷史」來解構現代生活的病態歷史，重建健全的人類生命史，其憂也深，其情也切。

學者趙園指出，湘西固屬「化外之境」，卻不是隱逸者的世界。那裡充滿濃烈的人間味、極其世俗的人生快樂。你更由作者的筆觸間，覺察到這世界的構築者本人對於那人生的怡然的滿足感。而那才是沈從文的本色。而基於此，沈從文筆下的風物人物都具體而親切近人，如他自己所說的，善於「體貼人情」；甚至他的「風俗畫」，也極饒風情的。婚喪慶弔等儀節風俗都被他生活化了，因此他的敘述雖常常是一串密匝匝的細節，一氣鋪排下來，但卻使人物與生活場景畢現，處處鮮活。而那「鋪排」卻又因行文的輕巧自然，而使人不覺其為「鋪排」。一些極不起眼的事物，只消樸素地寫出，就輕易地將你的類似經驗點醒了。沈從文放縱的想像和具體入微的描寫，使自由與節制，放與收，筆觸的疏與密、虛與實，在許多情況下，都配合得恰到好處，既灑脫而又謹嚴，近於藝術創造中「自由」的境界（注8）。

自從二〇年代末「革命文學」論爭以後，浪漫主義從五四時期的文學主潮之一的地位，退居到支流的位置。它與代表文藝主潮的左翼文藝運動產生了矛盾，而在相當長的時期裡，人們受「左」的思想的影響，獨尊寫實主義。在論及浪漫主義時，也只按郭沫若畫線，把郭沫若順應時代潮流的「轉變方向」，看做是浪漫主義思潮的壽終正寢。到三〇年代初，沈從文綜合了五四鄉土文學和創造社、新月社甚至京派作家的藝術經驗，將五四浪漫主義轉變為田園牧歌型的浪漫主義。它已不同於五四浪漫主義的風格了，它缺少了郁達夫自敘傳小說的那種強烈的激情。

沈從文寫得最好、最能體現出他個人風格的是以《邊城》、《蕭蕭》、《三三》、《阿黑小史》、《月下小景》為代表的湘西題材的小說，還有《豹子·媚金與那羊》、《神巫之愛》等寫傳說中具有神性的人物的浪漫小說。這些都是他「心和夢的歷史」，他以「節制」代替了激情。沈從文說：「我懂得『人』多了一些，懂得自己也多了些。在『偶然』之一，過去所以自處的『安全』方式上，我發現了節制的美麗。在另外一個『偶然』，目前所以自現的『忘我』方式上，我又發現了忠誠的美麗。在第三個『偶然』，所希望於未來『謹慎』方式上，我還發現了謙退中包含勇氣與明智的美麗。」（注9）雖然在當時以個性主義思想為基礎的現代浪漫主義思潮，處於左、右兩大勢力的夾縫中，生存空間大為縮小，已難現昔日輝煌了，但沈從文卻能退居社會的邊緣，專去描寫邊地的純樸民風，寧靜的自然風光，有其艱難的選擇。他



說：「我還得在『神』之解體的時代，重新給做一種讚頌。在充滿古典莊嚴與雅致的詩歌失去光輝和意義時，來謹謹慎慎寫最後一首抒情詩。」（注 10）

於是沈從文以田園牧歌的形式寫下了他對鄉土和家園的守望，他凸顯湘西世界蠻荒自然狀態和原始初民的神性、強力、元氣以及旺盛的情慾，讓讀者領略湘西世界的奇幻和浪漫，原始初民的自在與強健。學者劉洪濤就認為，如果說沈從文的湘西世界是一首牧歌，那麼美與生命則是它的主旋律（注 11）。在湘西的山山水水無不讓人心醉，薄暮時分「月光淡淡的灑滿了各處，如一首富於光色和諧雅麗的詩歌」，山寨中，樹林角上，平田的一隅，「飄颻著快樂的火焰」。還有清亮細碎的馬項鈴和沉靜莊嚴的銅鐸的聲音。而「雨落個不止，溪面一片煙」，特別是那城裡划龍船的蓬蓬鼓聲剛剛響起，這邊渡口上的人還反應不過來。那靈性十足的「黃狗汪汪的吠著，受了驚似的繞屋亂走，有人過渡時，便隨船過河東岸去，且跑到那小山頭向城裡一方面大吠。」

而當沈從文寫到《邊城》裡的翠翠時，說她「在風日裡長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綠水，一對眸子清如水晶」。作者把翠翠與自然山川靈氣融為一體，寫出一個勤勞、善良、精明、純潔的山村姑娘。她是美的化身、善的象徵。翠翠是善的，是美的，然而也是悲的。一條渡船不僅連接著老船夫與女兒苦難人生，而且連接孫女翠翠愛情上的不幸。大老和二老都愛上翠翠，翠翠喜歡的是二老，結果是順順派人來給大老作媒。團總給順順家提親，以輾坊作女兒的嫁妝，看中又恰恰是二老。二老為翠翠唱了一夜歌，恰好翠翠睡著了。大老因為同弟弟爭翠翠受挫，一氣之下，坐下一水船到茨灘時淹死了。二老因哥哥死去，又得不到翠翠理會，也坐船下了桃源。結尾是翠翠在渡船上，等待「那個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夢裡為歌聲把靈魂輕輕浮起來的年輕人，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就會回來。」

沈從文的「心和夢的歷史」，是美麗的，但美得總使人憂愁。尤其是在革命的年代裡，顯得頗為不合時宜，但他表面看來迂闊的追求卻更切近文學的本性，這也使得他這個自稱是「最後一個浪漫派」，在重新被發現時，又再度引發熱點，引人走進他的世界，感受那燃燒熱情釋放的縷縷浪漫。

注釋

1. 沈衛威〈鄉下人的紳士之路－沈從文與胡適往來書信解讀〉，收入《胡適與他的朋友》第六集，李又寧主編，紐約天外出版社，2001年。
2. 朱光潛〈從沈從文的人格看沈從文的文藝風格〉，《花城》，1980年，第5期。
3. 〈沈從文小說選集·題記〉，《沈從文文集》第十一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
- 4、6. 《浪漫主義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陳國恩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
5. 〈從徐志摩作品學習「抒情」〉，《沈從文文集》第十一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
7. 〈沈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沈從文文集》第十一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
8. 《論小說十家》，趙園著，浙江文藝出版社，1987年。
- 9、10. 〈水雲〉，《沈從文文集》第十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
11. 《邊城：牧歌與中國形象》，劉洪濤著，廣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